

关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思考

郑一帆的长篇小说《长河长流》在生活史、心灵史、地域文明史不同叙事维度同时推进,并以此为背景做了丰富的精神性书写。郑一帆以朴素的叙事全景铺展历史的沧桑和衰败,这构成了历史写作的显著特征。这部庄严与宁静的现实主义作品注重整个故事的客观推进,既显示了作家对生活的非超越性,同时又构成了叙事的水到渠成。这让作品叙事结构丰富而稳定,文本立体、饱满而富有色彩,整个叙事在一种统一的气质层面展开。

时光荏苒,各种话语权力如洪流滚滚,历史消退成恍惚记忆,我们并没有觉察或无力觉察。世界仿佛一下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其间无任何过程和步骤。生活以一种跨越的方式发展,并且几乎所有人都精神中认可了这种变化。《长河长流》把我们忘却的历史又重新交到我们手上。这是时光与记忆的失而复得。用“长河长流”这一词组来指称整部作品,在增加叙事层次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观察角度——让我们有一种仿佛回到过往时代的感受。它像一个坐标一样起一种引导作用,标志着我们物质和精神的轨迹。它还大致标识出我们目前所处的精神层次,以及我们离开出发点所走过的路程,还原了一种纵深感。我们并非忘记或忽略了历史,而是忘记或忽略了自己。《长河长流》把这种历史生活还给了我们。让时光回流和倒溯,这是一个优秀小说文本的指标和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

本书是一部蕴含丰富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长篇小说。作品中这个远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僻远的一隅,其实是中国最真实的时代影像。丰富、古老、传统、保守、风云际会的古城是小人物逐梦的圣地,也是他们梦想被挤压、破灭的地方。这里宁静、自然、贫穷,但又繁华、喧闹、残酷。对古城这个既是乡村又是城市空间的书写,实际上蕴含着关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思考。

还原一种悠然的精神状态

叙事的目的是让我们面对一种现实——我们曾经拥有的生活,或许我们感觉上并不认同是从那里出发,《长河长流》把感觉上并不认同的生活撩开。历史,让我们春心荡漾,也让我们倒吸一口凉气。夜可以说,这是作品的祛魅或招魂,这是文学所蕴含的力量。

但事情好像并不如此简单,郑一帆在《长河长流》里设置了一种精神性的隐性维度。它由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的精神气质与所表达客观的意识形态构成。作家表述和叙事,有时来自作家生命本身,有时来自那片土地曾经或现实的在场者。这是一种需要仔细辨别的体察。这种精神性的隐性维度使文本既具有庞大的信息量,又在立体的叙事中显得十分恰当。这使作品既具有强烈的阅读快感,又不会在这种感官刺激中淹没其思想内涵的深度。这带来文本另一种解读的可能性,即在阅读过程中,《长河长流》并不单指指向作为小说文本的一种文学性阅读,而是指向其他阅读的可能性,因为它并非一个单向度的文本。它完全可以作为一种富有文学意味的哲学或者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文本来解读,即它是一个具有多重意蕴和多指向性的文本,而这种文本是由其内在结构的复杂性与涵盖性及其精神高度决定,这样的文本往往具多义性、前瞻性与歧义性。当然,它更需要一种纯文学意义的解读,只有这样才会揭开作品的面纱呈现其光华,呈现其文本所隐藏的意义。

《长河长流》本质上是自由性、超越性和创造性的统一。首先,自由性表现为郑一帆笔下具有既包含某种在场的东西,又包含某种不在场的东西,即用有限的在场来表示无限的不在场;其次,超越性表现在郑一帆对于表象既能够突破自身,又能够突破客观现实以及时空限制,这是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的升华;最后,创造性表现为郑一帆既能创造文学形象,又能把形象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是对历史写作的综合把握。特别要指出的是,虽然郑一帆的历史写作是基于历史特有的地理空间、历史变迁和文化形态,但作为一种文学创造活动,这具体又涉及及对历史的感知、筛选、描述和意义赋予,表达的是对历史的认识、期待和回忆,因而无法避免作家主观色彩、审美情感和心灵启悟的浸染。中国古代文论中,“想象”是文学的核心词。

我们处于一个普遍缺乏文学耐性与文学穿透力的时代。真正意义的文学性文本,总会被我们当成商品来消费。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把所面对的对象指称

岁月长河的追索

——读郑一帆长篇小说《长河长流》

龙潜

为商品。我们是一群被时代牵着鼻子跑的人。郑一帆恰恰在这样一个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回望和观照历史的文本——我们的确需要这样的文学来滋润生活焦虑,还原一种悠然的精神状态。

越野车在藏北雪域吞噬黑夜的宁静

如果留心一下,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郑一帆关于历史文明的叙事节奏是逐渐加快增强的。开始的节奏类似牧歌,但渐显恣肆——有点像一台越野车在藏北雪域吞噬黑夜的宁静。作家大概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对叙事进行一种多余的艺术处理,他觉得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先把它作为一种生活保存下来,意义尚在其次,且来日方长。从写作的角度看,此时作家的叙事品质会经受最大限度的考验。郑一帆属于那种本质上趋于现实主义表述的作家,浪漫主义精神表象下掩藏的是理性主义的本质。这种表达的选择表现了作家的精神品质,这是作家的一种气魄与勇气。

《长河长流》不只是呈现一幅温情的文明史画面,还唤醒早已丧失的地域记忆——我们曾经拥有的人生状态,曾经的语言与交流,曾经的灵魂歌唱。《长河长流》不只告诉我们一个遥远的美好事实,而且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的现实性:我们不只失去了作为美好现实的客体环境,而且可怕的是我们还失去了作为美好现实的主体性。

小说对历史的表达对于当下语境的作家来说,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这源于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冲击和混乱,当然也有叙述的限度。这种难度还在于对现代文明的把握及对当下文明的认识高度。作家的思维往往会为现代文明所遮蔽和扰乱而使文本流于浮泛进而失去其意义。但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文本经验支撑的作家,郑一帆无论从技术层面和思想层面,还是作为作家对于现代文明的把握早已积淀了足够的储备。可以说,郑一帆是一个早已完成宏大叙事原始资本积累的作家。

中国大地上的作家

郑一帆是一个古典主义意义的作家。这样说当然是我们注意到作家对古典和传统的持久关注与表达。《长河长流》就是一个表现社会持续性的作品。一般而言,认为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应该持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疏离甚至对抗的姿态,或服从一种与之相对的思想,这其实是一种简单的文化专制主义。这是由社会整体性知识结构与道德、精神、宗教等匮乏的深层原因所致。郑一帆是一个社会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建设者,但不只如此,郑一帆身上一点都不缺乏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态度与精神气质,而且按照西方文明的标准,《长河长流》甚至有着诸多后现代主义目标的痕迹。这不用奇怪,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更多是一个复合体,而非一种标签化的人格符号。郑一帆是一个中国大地上的作家,他把生活经验变成了自己的整体精神。这种力量来自作家生命历程及其支撑作家生命历程的现实基础。而他对于各种思想的综合融汇更能整体地体现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现代性,一方面是对古典与传统的执着,另一方面是对各种现代思想的把握。

《长河长流》对历史地域文明的书写,在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具有典型标本的意义。这里就隐含着另一重意义,即在当下时代精神背景中,《长河长流》提供了一个富有意味的文本——它的意义在于它几乎完整地记录了一个地域的精神文明史。

沈从文渴望建造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以实现其文学理想,作品表现了湘西乡土社会的美好人性和原始图景。中国现代文学,表现人性的善是一种深厚的母题传统。克己复礼,即克服自己的私欲以维持既定的伦理。“礼”是人的善,是一种高标准的道德自



觉,时间是笼罩在空间纬度之上的一种强大的力量。历史中那些往事和人物作为一种文学表达,在被阐释的同时也被想象,在当下与过去、保守与激进、传统与现代的比较中,历史的体验得到强化。巴赫金在谈到歌德作品中的时间问题时,认为歌德能在物体身上看到不同时间的存在及其背后所蕴藉的思想内涵。克拉克在《文学地理学》中认为地理应该被视为承载民族故事、观念信仰和展现民族特征的“文本”,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地理时,应该把地理视为“历史重写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中说:“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成为一个有记忆的群体,因此,只有借助于文化记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

看到越野车外狼、熊和雪豹的狰狞

高尔基说,我们的身后是燃烧过后的灰烬,我们的前面也还是未知的黑暗。一个社会在时光流年中自然会积累文化,在漫长的社会演进中,文化自然也会发生变异,但就其本性而言文化是稳定的,改天换地或许可以,但不能要求很快改变和更新文化。文化有不可选择的一面,如同孩子不能选择母亲。进步、革命、科学、启蒙是20世纪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号。五四文化启蒙运动的重大成果之一,是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否定树立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的基调。摒弃传统为先进知识分子之所以先进的表征。这种先进导致今天的我们总处于失重状态。时代的突然性和紧迫性如此强烈——如同在藏北雪域已经看到越野车外狼、熊和雪豹的狰狞。但是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对时代并没有积累足够的认识和警惕,更不要说有效的应对措施。让人觉得缺乏安全感。这是《长河长流》阅读后在现实意义层面的最大收获,它把藏在我们心中忧伤一把揪了出来。

焦灼,从人文意义上说,指称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这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也是文学的特色。《长河长流》依然用一种现实主义原则对生活进行解剖。是什么使郑一帆摆脱这个时代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叙事语境的困境?这要归功于理性主义。这种法则或许是从最为古典的方法论中吸取而来,也有可能是在年轻时生活的那些山涧吸取而来。

“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这是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话。现实中无法获得的,可以在想象的世界里得以满足、替代或消解。郑一帆通过写作进入历史,缓解现实的疼痛,最终超越现实的存在。文学在此发挥了实现自我的作用,实现了自身的精神救赎与精神超越。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够通过引起人类的恐惧和怜悯起到宣泄情感的重要作用。与其说郑一帆进入历史是为了与历史沟通,倒不如说郑一帆是想从历史中获得治疗、补偿和升华,从而获得心理的平衡,缓解现实世界不堪的存在。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尊,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倔强。

先锋性与丰富性

《长河长流》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先锋性。先锋性并非指它写作技术上对于某种先锋经验的借鉴,而是在于它的综合叙事纬度及其内在书写逻辑。在文学界甚至学术界对社会历史发展路径尚未有明确的整体性理解背景下,《长河长流》不只厘清了社会历史的发展道路,而且以少有的清醒、独立与勇敢拿出了自己的文本。这可以解读为历史一直处于郑一帆的思想视域之中。《长河长流》有更多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内容等待读者去慢慢消化。

《长河长流》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丰富性。多元的社会因素和多重的叙事统一在简朴叙事的理性原则之下,《长河长流》没有仅仅追求文学或美学效果,而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种社会思想效果,以达到对社会文明过渡客观性的涵盖目的,这是区别于其他文学性文本而更具有社会性的标识。

巴赫金向我们指出叙事中时间与空间的相互关系,并强调了“空间”是叙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长河长流》中人的命运和地域的发展杂糅一起,让人看到沧海桑田。“长河”这个词本身就具有某种隐喻的指向,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指称,不仅仅是关于岁月的指称,甚至它还是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指涉。按照北大陈平原的观点,不同空间场景的并置、对比、组合,可以使文本获得另外一种较为特殊的美感效果。这样的布局其实隐藏在《长河长流》的整体构思以及对历史的理解和想象。

约瑟夫·弗兰克指出普鲁斯特、乔伊斯、艾略特的作品是用“同在性”取代了“顺序性”,因而是“空间的”。显然他所指的空间是抽象化的、符号化的空间,也即是文本的空间形式和空间结构。在对《长河长流》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就形式谈形式,而是包含了对具体的历史人文的理解。在约瑟夫·弗兰克看来,空间的并置叙事就是将多种空间在文本中并置排列在一起,借此展示出具有同等价值内容的共时性结构。弗兰克的论述是针对传统小说按时间顺序来安排结构而言的,他在此强调了小说对时间序列性的抛弃以及对空间同时性的重视。《长河长流》运用空间并置的叙述方法来讲述历史,表达自己的时空体验,通过空间的并置叙事实现了作品的丰富性。郑一帆对历史的写作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构建,而是试图通过不同时空的拼接和并置,把历史真实地展示出来,使它们得以同时并存在有限的叙述空间内,从而使读者能够了解一个更加真实、更加全面的中国社会。历史的异质性、非理性、边缘性和陌生感更多来自作家的体认。所谓历史写作,离不开对历史的文学性感知、体验和表达。古人就常常在想象中构建“天下”的概念。

美好历史和美好故乡是不存在的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表达的是思乡的惆怅;“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表达的是夙愿得偿的喜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表达的是对自身命运的哀叹。中国古典文学中故乡的意义相对确定。传统的故乡叙事常常会建构“失落园”模式,表现时间的流逝,进而生发相关的感慨,包含着浪漫主义的对旧日时光的缅怀。中国现代文学中故乡的含义开始丰富,意义也变得复杂,通常蕴含了启蒙思想对社会现实和国民性的批判。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各类故乡历史书之所以先进的表征。这种先进导致今天的我们总处于失重状态。时代的突然性和紧迫性如此强烈——如同在藏北雪域已经看到越野车外狼、熊和雪豹的狰狞。但是更为糟糕的是我们对时代并没有积累足够的认识和警惕,更不要说有效的应对措施。让人觉得缺乏安全感。这是《长河长流》阅读后在现实意义层面的最大收获,它把藏在

我们心中忧伤一把揪了出来。焦灼,从人文意义上说,指称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这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也是文学的特色。《长河长流》依然用一种现实主义原则对生活进行解剖。是什么使郑一帆摆脱这个时代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叙事语境的困境?这要归功于理性主义。这种法则或许是从最为古典的方法论中吸取而来,也有可能是在年轻时生活的那些山涧吸取而来。“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这是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话。现实中无法获得的,可以在想象的世界里得以满足、替代或消解。郑一帆通过写作进入历史,缓解现实的疼痛,最终超越现实的存在。文学在此发挥了实现自我的作用,实现了自身的精神救赎与精神超越。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能够通过引起人类的恐惧和怜悯起到宣泄情感的重要作用。与其说郑一帆进入历史是为了与历史沟通,倒不如说郑一帆是想从历史中获得治疗、补偿和升华,从而获得心理的平衡,缓解现实世界不堪的存在。这

坚守与突围:一个基层新闻人的时代答卷

——读陈杨《通往融媒之路》

张勇

是他不变的准则。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实则是永葆初心、勇担使命的无悔追求和坚守,不仅成就了个人的职业高度,获评高级编辑,更诠释了何为“择一事终一生”的信仰——它不是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伏案疾书、年复一年的编辑审稿,是腰间盘突出仍笔耕不辍的倔强,是“办公室夜晚少有亮着的灯”背后的孤勇。

守正与创新:融媒时代的破局之道

面对“报纸,一叶摇晃的扁舟”的行业困境,陈杨的叙事没有沉溺于怀旧,而是以开放创新姿态拥抱变革。从“起步网站:本土为先”,到“报纸不只是一张报纸”;从“论坛,‘开门办网’的样本”,到探索“防止沦为新版纸媒”的融媒路径,基层新闻人的每一步尝试都紧扣时代脉搏。难能可贵的是,传统媒体人始终清醒:技术只是工具,内容才是灵魂。

书中对“求解‘卡脖子’难题”的剖析尤为深刻。当同行苦于“爆款缺用户,有平台少流量”的困境时,陈杨提出“求解人才短板”“坚持受众意识”,强调“无视频

风骨与温情:一个新闻人的精神肖像

陈杨的文字里,既有媒体人的风骨,亦有普通人的温情。他坦承“很不屑阿谀奉承、大话连篇、请客送礼之人”,直言“怕曝光”的官僚心态,却始终相信“大多数媒体人经受住了考验”;他调侃自己是“无趣之人”,却将耕耘编采业务升华为“蜜蜂采蜜”般的生命状态;他回忆父母赋予的“正统教育”,坦言“家庭影响塑造了独立思考、踏实做事、低调做人



在信息爆炸与媒体迭代的浪潮中,尤其融媒体的汹涌澎湃,传统媒体和新闻人的坚守与突围,始终是一道值得深思的命题。陈杨的《通往融媒之路》以四十余载新闻生涯为经纬,编织出一幅基层新闻媒体从铅字油墨到数字荧屏的转型图景。这部书既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亦是一面映照基层新闻媒体变革的棱镜。全书没有宏大理论框架,亦无浮华辞藻堆砌,以质朴的笔触、坦率的反思、鲜活的案例和务实的经验,为基层新闻媒体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生存指南”,更让人看到一代新闻人坚守初心、拥抱变革的精神史诗。

择一事终一生:匠人精神的当代诠释

“献了青春献终身”,陈杨用这句话概括自己的职业生涯,却无意间道破了新闻媒体行业的本质——匠人精神。从18岁踏入报社的练习生,到执掌媒体业务的副总编,他始终将新闻视为“手艺”而非“职业”。书中章节“黑白颠倒”练就真功“最快的脚步是坚持”以及在编审中“与每一个字搏斗”,恰是这种匠人精神的生动实践与注脚。

在传统媒体黄金年代,陈杨深耕时政报道,以《我国内河港口建设的重大突破涪陵大水位差码头发挥效益》《武陵县首创“北羊南移”新法》等作品叩开央媒大门;在纸媒式微的困境中,他又以主导策划《巴渝都市报》转型、创办网站和手机报等实践,探索新媒体生存之道。无论媒体如何变迁,“勤动笔、勤思考、勤总结”始终

母、以“60后”的视角反思时代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体记忆的存档,更是一代人的精神图谱;在政治挂帅的童年里寻找启蒙,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坚守理想,在时代剧变中完成自我重塑。这种将个人史与行业史、家史交织的写作,让《通往融媒之路》超越了职业手册的范畴,升华为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生命之书”。

永无尾声的结语: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卢新宁曾言:“新闻是历史的底稿。”而陈杨用四十余年职业生涯证明:这份底稿的书写者,既需要“妙手著文章”的专业素养,更需要“铁肩担责任”的精神脊梁。在人人皆媒的今天,《通往融媒之路》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基层新闻媒体留存了一份珍贵的实践档案,更在于它传递了一种信念:无论技术如何颠覆、舆论场如何喧嚣,真正的新闻人永远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性——对职业的坚守、对创新的追求、对时代的关切。这份确定性,或许正是抵御有人说新闻就要“把人打晕”争议的最佳答案。

山高水长!长长的路,慢慢地走……《通往融媒之路》以文字的温度、深度和高度度阅了一个资深党媒人的初心与担当,更是为业界提供了深入学习借鉴的个案和范式。春暖花开,这册散发着缕缕墨香的作品书页灵动,在祝福与憧憬中走近每一个追随者、追梦人,以其温润如玉品格,让“相信相信的力量”凝聚成为澎湃动能,穿越时空抵达愿景的彼岸。